

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

隐匿的对话

——施米特与施特劳斯

[德] 迈尔 著

朱雁冰 汪庆华 等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斯特劳斯/(德)迈尔著;朱雁冰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

(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

ISBN 7-5080-2776-0

I. 隐… II. ①迈…②朱… III. ①施米特—政治哲学—哲学思想—

研究 ②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7722 号

Dialog unter Abwesenden Carl Schmitt und Leo Strauss

Heinrich Meier

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斯特劳斯

[德] 迈尔 著

朱雁冰 等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7月北京第1版

200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87千字

定 价: 2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翻译事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

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发展。设计这套“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编者的话

去年冬天,德国西门子基金会学术部总监、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教授迈尔博士(Prof. Dr. Heinrich Meier)写信给我,说北京大学要邀请他去讲学。他颇感犹豫,想听听我的意见,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声名显赫的哲学家(不会像哈贝马斯、德里达访华那样成为盛事——这括号中的话是我现在加的),而且不懂得北京大学有多少师生对施米特和施特劳斯这两个人感兴趣。我要是给迈尔博士泼冷水,他真的可能就不来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当然极力怂恿他来,尽管我晓得,我们这里对施米特和施特劳斯问题感兴趣的不多——也多不得,但感兴趣的人毕竟有。苏格拉底除了在法庭面对公众替自己申辩,似乎从来没有搞过大型演讲,至多与几个人一起喝酒对侃。至于迈尔博士在中国学界还不知名的事情,我说那倒不一定:不是有两个学刊都已经翻译刊登他的论著了吗?到头来,我干脆建议把他的几篇论文辑在一起,出个中文版。

这里辑录的八篇论文,如作者在“中译本序”中所说,都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或者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分。据我所知,其中好些篇迄今还没有英译和日译;汉语学界与欧洲学界的接触,不必借道美国或日本——据说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中译本就是其第一个外语译本,这优良传统还是值得继承。

前三篇出自迈尔博士的专著:《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Carl Schmitt, Leo Strauss und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 Zu einem Dialog unter Abwesenden* [Verlag J. B. Metzler, Stuttgart/Weimar 1998 增订版]),该书初版于1988年,《与哲学家为敌》(*Der Philosoph als Feind. Zu Carl Schmitts "Glossarium"*)和《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Eine theologische oder eine philosophische Politik der Freundschaft?*)是增订版才加进去的。《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是迈尔的成名作,在欧美学界产生了隐匿而深远的影响,原因不难理解: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对话是二十世纪政治思想领域

含义至深的重大事件,理解这一事件,事关人类精神在后现代处境中的重新定位。这篇论著的中译,原刊舒炜主编的《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版 2002,据英译本译,汪庆华译、李猛校),这里刊出的译本,请王骥博士据德文原书作了校订,补译了“前言”和两个附录中的“编者按语”。

《什么是政治神学?》(*Was ist Politische Theologie? Einführende Bemerkungen zu einem umstrittenen Begriff*),原为海德堡大学教授艾斯曼的《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政治神学》(*Jan Assmann, Politische Theologie zwischen Aegypten und Israel, 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Stiftung* 1992)一书导言。如读者会看到的那样,除了最后两句话,这篇导言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政治神学》没有直接关系,倒是与施米特和施特劳斯之间的“政治神学”密切相干。

以上四篇的论述主题以施米特为主,尽管论述框架始终是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思维关系。接下来的四篇以施特劳斯为主,不过,许多时候,论述框架就不一定是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思维关系了。与施米特在 1932 年的思维交锋,是施特劳斯思维真正起步的标志;这四篇论文的中心主题毋宁说是:施特劳斯的思维如何起步、走向何方。我相信,这也是迈尔博士的研究所要进一步探究的方向。

《为什么是政治哲学?》(*Warum Politische Philosophie? Verlag J.B. Metzler, Stuttgart/ Weimar 2000*)是迈尔博士受聘为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就职讲演稿,中译文原刊萌萌主编的《理性与启示》(第二辑,北京:中国社科版 2002),这里刊出的文本仅作了个别文字改动,补译了一段法文引文和拉丁语引文。这篇文章刚好与《什么是政治神学?》衔接,构成论题的内在转换。

接下来的两篇,是迈尔博士为其主编的《施特劳斯文集》(*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Heinrich und Wiebke Meier, Verlag J. B. Metzler, Stuttgart Weimar*)第二、三卷写的“编者前言”(Vorwort des Herausgebers)。这两卷的具体书名分别是:《哲学与律法:早期论著》(*Philosophie und Gesetz: Frühe Schriften, 1997*)和《霍布斯的政治学及其相关论著和书信》(*Hobbe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und zugehörige Schriften - Briefe, 2001*)。按文章内容,我给这两篇“编者前言”另取了篇名,并得到作者首肯。

迈尔博士十五年前着手编辑《施特劳斯文集》，前三卷收全了施特劳斯移居美国改用英文写作之前所有用德文写的论著和文章。第一卷的“编者前言”不长，多是文献性说明——那一时期的施特劳斯还处于修习阶段，尽管切入点已经不同凡响。第二、三卷不同，是施特劳斯思想形成阶段的写照——迈尔博士的两个长篇“编者前言”对此有深入细致的论析，一些地方读来令人叹息，难免想到我们自己所走过的路。

《施特劳斯的思想运动》(*Die Denkbewegung von Leo Strauss: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Intention des Philosophen*, Verlag J. B. Metzler, Stuttgart Weimar 1996)是单独出版的，摆在这本论题明确的文集的结尾，恰如其分。按迈尔博士的说法，此书的着眼点与《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一样，关注的是思想的起点；正如后来他写了《施米特的学说》，他还将写一本题为《论政治哲学的实事》(*Zur Sache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的专著，阐发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

八篇文章的顺序是我安排的，书名亦由笔者所拟，当然都经作者首肯。两个附录是迈尔 1988 年那本书中原有的，移作全书附录仍然恰当。

奇文共赏、疑义相析——《以哲学家为敌》一文的写法尤其让人开眼界：哲学家如何在传媒说话。笔者五年前读《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有恍然之感；如今编出这个文集与哲学和神学爱好者共赏相析。感谢迈尔博士提供的各种帮助和支持（从赠书到解答翻译上的疑难）；感谢各位译者，尤其朱雁冰教授的热情支持——否则活儿不会这么快就完。

施特劳斯生前曾两次——仅仅两次——公开与同时代思想家严肃认真地争辩：三十年代与施米特、四十年代与科耶夫；论辩对象恰好分别是其一生关注的“神学—政治问题”的两翼最突出的代表。关于与科耶夫的论争，请参见笔者编的《驯服欲望：施特劳斯笔下的色诺芬撰述》（北京：华夏版 2002）。两书合观，可能会有相互发明之效。

刘小枫

2002 年 4 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中译本序

迈尔

王 骅 译

这里收集的八篇研究论文出于1987至2001年间,论及施米特和施特劳斯,涉及宗教与政治的关联、哲学与神学的纠缠以及政治与哲学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共同围绕神学-政治问题,通过区分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来阐明这一问题,并力图引出回答。

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牵扯到两个选择性的理论概念,它们为两种选择性的生存立场(existentielle positionen)或者“我应该如何生活”的两种截然对立的回答提供理由。可以从四个方面的概念规定来把握政治哲学:首先,其对象是政治的和人类的事务;同时,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样式,或者说对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因此,它为哲学的生活方式提供理性的证明;最后,它是哲人认识自己的位置所在。政治神学的认识对象同样是政治的事务,但与政治哲学不同,政治神学要求自身成为基于神性启示之最高裁决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因而政治神学服务于终极权威,在顺从启示的全能上帝的历史行动这一义务中找到自身的理由。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特征都涉及到反省的立场:哲人与信奉启示的理论家的思想和行动,分别成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中心对象。

本书中的八篇论文致力于搞清楚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分,辨析这两种不同的思想立场之间所涉及到的实质内容以及双方的自我理解。首先是《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1988),在这里,我审理了政治神学家施米特与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围绕如何理解政治展开的直接争辩;这一研究的姐妹篇是我1994年出版的《施米特的学说:四论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分》(*Die Lehre Carl Schmitts. Vier Kapitel zur Unterscheidung Politischer Theologie und Politischer Philosophie*)——中文译本可望在明年出版,这两篇研究

都是对[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的分析和批判。我在1988年出版的那本小书激发了关于施米特的国际性论争,也深化了政治神学研究;十年后出版增订本(1998)时作为“跋”收进来的《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一文,同样是对政治神学的分析和批判:在第二节中,我把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分用来解释德里达的思想;在第三节里,我集中解释了出现在施特劳斯哲学中的神学-政治问题的核心含义。《与哲学家为敌》是为杂志写的一篇文章,评1991年问世的施米特遗稿《语汇》;在这部遗稿中,施米特的政治-神学立场显得比他迄今已经为人所知的大部分论著都要尖锐得多。我为《施特劳斯文集》写的两篇导言,力图描述施特劳斯在坚持不懈地思考神学-政治问题中走向并彻底理解政治哲学时所走过的路。《施特劳斯的运动》试图描述施特劳斯哲学活动的基本意图,以及这一思想运动中所包含的真正的哲学行动。《什么是政治神学?》与《为什么是政治哲学?》分别历史地呈现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过去,从而提纲挈领地指明,这两位思想家的思想行程[的意义]跨越他们自身,延伸到未来。

感谢刘小枫教授建议我将上述论文辑在一起出版中文译本,他亲自编排并最终使得中译本问世。他的努力无异于开启了一场新的隐匿的对话:一个德国作者与中国读者的相逢——中国读者并不知道这位德国作者,这位德国作者也不晓得,本书中涉及的论题与中国读者究竟有什么具体关系。不过,哲学的自我认识和使哲学重新成为生活方式的事情,其现实性对于中国读者与对于欧洲或北美的读者,大概并没有什么不同。《隐匿的对话》在为一种生活申辩,这种生活如果实现了的话——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会是美好的。

Heinrich Meier München, März

2002年3月,慕尼黑

目 录

编者的话 / 刘小枫·····	1
中译本序 / 迈尔·····	1
以哲学家为敌:评施米特的《语汇》·····	1
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	9
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 ·····	71
什么是政治神学? ·····	97
为什么是政治哲学? ·····	106
哲学与律法:转向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 ·····	129
施特劳斯的霍布斯批判·····	150
施特劳斯的 ^① 思想运动:哲学史与哲人的意图 ·····	175
附录:	
附录一:《政治的概念》评注 ····· 施特劳斯	191
附录二:施特劳斯致施米特的三封信 ·····	210

以哲学家为敌

——评施米特的《语汇》

这篇评论是为传媒而作。由此可以解释本文的行文和快节奏特点。《明镜》周刊于 1991 年 7 月 29 日——即施米特的《语汇》上市的同一个星期——刊出这篇文章时，用的不是我拟的这个标题，而且编者对多处作了改动。这里的文本在所有细微处都是按我当初的原文，只有标示《语汇》出处的页码是后来加的。

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是经北京到柏林的。这位法国经济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柏林稍事停留，以便对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同盟的头头们发表演讲。在柏林狄亚娜湖(Diana - See)畔宫廷饭店，这位巴黎客人向杜奇克公司(Dutschke & Co.)建议，他们现在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学希腊文。人们不曾料到，这位名人对“怎么办？”问题的回答竟然是：他在三十年代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传奇性讲座曾激发了整整一代法国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灵感。科耶夫滞留柏林期间，照顾他的多年相识从这位黑格尔信徒口中听到，他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是普莱滕伯格(Plettenberg, [译按]施米特的家乡镇名)，不免大为吃惊。“在德国还值得去哪里？施米特才是惟一值得拜访聊聊的人”。

巴黎 - 北京 - 柏林 - 普莱滕伯格。这一幕发生在 1967 年，科耶夫去世前一年。陶伯斯(Jacob Taubes)这位 1987 年去世的柏林自由大学犹太学和解释学教授刊登在左派《日报》(Tageszeitung)上的施米特悼文记载了这一幕。悼文以《施米特——反对革命的终末启示宣告者》为题，占了整整两版。作者一开始便承认，自己要想“表达对施米特的景仰，虽然我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犹太人属于被他‘认作敌人’的人”。不久以后，我们听说陶伯斯步科耶夫后尘，稍为迟疑之后

便踏上去藻厄兰的路。^①

普莱滕伯格镇是施米特失去柏林大学公法学教授教职、被美军监禁达两年之久后于1947年退隐的所在地。施米特称他1888年出生、1985年以近97岁高龄离世的普莱滕伯格镇的老屋为“圣卡齐亚诺”(San Casciano)。

这个“可怜的老人”用此名称来标志其创造力的高峰和如日中天的成年时代,这意味着他把自己看作对迫害和诱使犯罪“失去抵抗力的牺牲品”。美第奇家族(Medici)结束佛罗伦萨共和国时,马基雅维里被免去了国务委员之职,还遭到迫害、拷打,事后他便蛰居于圣卡齐亚诺附近的庄园。当然,施米特下野并非某个僭主造成的。

这是施米特与纳粹政权理不清的复杂合作的结果。施米特虽然既未选举、也没有“授权”希特勒,甚至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还几乎毫无掩饰地持反[纳粹]“运动”的立场。然而,“授权法案”(Ermächtigungsgesetz)通过之后,^②施米特立即便站到了“新事实的土地”上。[新政府]制定1933年4月颁布的“帝国总督法案”(Reichsstatthaltergesetz)时,^③施米特起了决定性作用,并在5月1日入了纳粹党。1933年7月初,施米特被戈林(Hermann Göring)召进普鲁士州议会,不久便在纳粹党员法学家协会中占据了最高职务,但1936年因党卫军报纸《黑衣军团》的攻击又失去了这些职务。不过,在遭到党卫军指控其有天主教背景之后,施米特仍然继续公开支持纳粹政权。施米特激烈的排犹诽谤言论也如此,从193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施米特自豪地自比马基雅维里,这使我们注意到一些并非不重要的差别。与马基雅维里不同,施米特在其几近四十年的“圣卡齐亚诺”的退隐生活中,既没有创作《曼陀罗花》,也没有撰修《佛罗伦萨史》,更不必说写《君主论》和《论李维的前十书》了。施米特不过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1963)和《政治

① [译按]藻厄兰(Sauer Land),普莱滕伯格所在地区名。

② [译按]“授权法”,即1933年3月24日德国国会通过的将全部国家权力授予纳粹政府的法案。

③ [译按]按此法案,中央政府在各州设常驻代表,以加强对各州的控制。

的神学续篇》(1970),还有一篇简略的《〈哈姆雷特〉评注》及一系列文章,其中有论霍布斯(1965)和克劳塞维茨(1967)的。显然,施米特论题广泛的重要著作,都是1947年以前的。论题相对较为褊狭的晚期作品,基本上只是重新提出1945年以前时期的主题和论点。

那位佛罗伦萨的哲学家利用因政治原因被强加的赋闲时间,为自己开拓尚未探索过的思想的“陆地和海洋”([译按]这本是施米特一本小书的书名,作者一语双关),迫害使他得到解脱,让他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施米特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似乎瘫了。

马基雅维里到中年时,一直与李维、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深入对话;施米特却找自己过去的美好时日的旧相识对话,置身于迅速扩大的学生圈子,还常与相当浅薄的信徒往来。

马基雅维里在圣卡齐亚诺时,晚上常着节日盛装造访“老人们的院落”,以便向他们学习。施米特则在自己的庭院接待来访者。在施米特的“圣卡齐亚诺”,常有学界名流到访:从保守的社会学家格伦(Arnold Gehlen)、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到毛泽东著作的读者和游击队理论家席克(Joachim Schickel),从原子物理学家约旦(Pascual Jordan)到明斯特(S. Munster, 1488-1552, [译按]德国希伯来学家)的信徒、哲学教授里特(J. Ritter),后者为他最有天赋的学生建立了进入坐落于附近的普莱滕伯格的联系。此外,施米特还一直与那些寓居于最偏远的角落的年轻天才保持广泛的通信联系。

这一切使得人们趋向于赞成这样的结论:自1945年以来被禁止担任教职的施米特,在德国和外国大学里比他同时代任何一个教授都拥有更多学生。这些学生从未在他门下就读,他们教授着各门学科,其中有政治学家、文艺理论家、法学家、神学家、社会学家、古今哲学史家。更值得注意的是,施米特的影响跨越了各种政治营垒。

如何解释人们对施米特如此强烈的兴趣?什么东西使得陶伯斯产生“敬畏”之感,尽管他有理由不应对施米特深刻的敌视犹太人的态度抱什么幻想?什么推动科耶夫这个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和第五共和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如果我们相信阿隆[Raymond Aron])与普莱滕伯格保持联系?

仅仅说这个可鄙的声名狼藉的人具有可怕魅力和影响,显然不够。如果只是将施米特看成“第三帝国御用法学家”,看成政治上的

机会主义者和无所顾忌的玩家,其令人注目的影响就仍然得不到解释。即便一些人对这位舌巧如簧、善于将任何事情说得天花乱坠的谈家赞不绝口,景慕这位作家机智、文笔洗练得令人神往、始终让人“兴味盎然”,也没有说清楚施米特的力量究竟何在。

这个令人景仰而又声名狼藉的作家和谈家借以展示其影响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们可以找到一条线索,以便走出施米特那些包含着如此多的历史典故和政治行话、如此多的蓄意误导和被迫隐晦的全部著作的迷宫吗?

刚刚出版的一本从施米特遗稿中发现的著作,^①给这些问题投上了一束新的光亮。这束光比人们所期待的更强烈、更明亮。在题为《政治的神学续篇:终结所有政治的神学的传说》这部最后的专著出版20年以后,这位政治神学家又一次发言,在去世后又一次参与辩论。

《语汇》写于1947至1951年间,篇幅仅次于1928年的《宪法学说》,与《从被缚中获救:1945至1947年间的经验》一样,最具私人性质。某种程度上,它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施米特。展示了他光彩照人的才华和令人颤栗的坚韧。在这本书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深沉的思考与没有道理的轻浮、冷静辨识与几乎无以复加的刚愎自用如何间杂在一起。

在评论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s)“权力本身便是恶”这一名言时,施米特说,与这话相比,“巴枯宁所有作品中的无神论和虚无主义都算不得什么了。今天,有谁知道,这话与‘上帝死了’是同一个意思”(页201)。接下来我们又读到:“我此生所为,无非是发出经审慎思考和周密设想的无私而善意的警告。可是,被警告的人总以为受到烦人的干扰,到头来要将我置于死地。”(页319)

我们被施米特教训说,他“握有世界之灵(Weltgeist)的一切特权和豁免证明,谁不直截了当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是我的朋友”(页104)。我们不断听到一个牢骚满腹的人无耻的自我哀怜,他抱怨说,“最愚蠢的”是,“20年以来”——自《政治的概念》(1927)发表以来针

① 施米特:《语汇: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一年间杂记》,Eberhard Freiherr von Medem编,Berlin,共364页。

对他的“犯罪企图”(页 265)。这个貌似无畏、视正确区分敌友为特殊政治使命的政治理论家,只要面临敌意的对待,便认为自己遭到“屠杀基督的凶手们”的迫害(页 232、287、308/309、313)。

《语汇》是施米特写的笔记,时而每天写,时而又好久不写,有思考、时评、书信节录等等,熟悉施米特著作的读者从中会碰到许多熟知的惯用语句:国家时代的终结、国家间的战争变成世界内战、可见与不可见教会的辩证法、合法性的厄运。施米特“对法律的挞伐”(页 64)比在以前已知的作品中有了更清晰的轮廓。

纽伦堡审判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与之相当的是德国历史的“畸形发展”、歌德与荷尔德林、唯美主义与为希特勒开路的天才崇拜。“历史学家之争”的斗士随处可见。怀着道德义愤批判施米特的人与景仰他、为他辩护的人多年来激烈争论不休,本书有足够的材料为这一论争提供新的支持。为施米特辩护的人将在《语汇》中满意地读到,施米特出乎意料地看到,“自己的生命在 1949 年 5 月 23 日颁布的波恩基本法中得到延续”(页 266)。至于批判施米特的人,则不放过笔记中任何往往以“施特劳宾格兄弟”(Bruder Straubinger)之名出现的说到希特勒的言论。不过,我们不打算急于对论争两方说三道四。

线索是怎样的呢?关于施米特精神存在的中心,我们从《语汇》中了解到什么呢?施米特给予的最直接的回答是:“我的全部精神和写作生活的奥秘是:为深化天主教信仰(以反对中立化者、反对审美的懒汉、反对堕胎、焚尸者和和平主义)而拼搏。在这里,在深化天主教信仰的道路上……所有那些人——甚至巴尔(Hugo Ball)都远离我。我只剩下魏斯(Konrad Weiß)和亚当斯(Paul Adams)那样的忠诚友人。”(页 165)

让我们听听另一种同样值得注意的自我解释。施米特原本是以法文表述这一解释的:“我自己当然一如既往。对于理念的自由在我是无限的,因为我始终与自己心中不容侵占的中心保持联系,这个中心并非理念,而是一场历史事件:神子成为肉身。对我而言,基督教并非首先是一种教义,也非道德,甚至也不是(请宽恕我)一种宗教;它首先是一个历史事件。”(页 283)

最重要的、决定一切的历史事件,是“上帝成人,这才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施米特在《语汇》中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是政治神学家。

严格意义上来理解的政治神学,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启示基础上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顺从至高的权威,同时将自己理解为处于“被检验和受审判的地位”的历史行动。

施米特是政治神学家,而非什么存在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敌友论并非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把施米特解释成存在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就忽略了其思想中的启示和基督教的成分。这种解释来自洛维特(Karl Löwith)1935年用笔名发表的一篇题为《政治的决断论》(*Politischer Dezisionismus*)的文章。自那以来,这种解释就不断变换形式,一再出现于无数文章和博士论文中,被囫圇吞枣地重复。迄今为止,这种解释变成了众口一词将施米特、恽格尔、海德格尔的名字扯在一起的公共场所,似乎这三个人是一码子事。

且让我们从个人关系谈起。三十年代初,施米特在柏林认识恽格尔,从此两人终生保持联系。至于海德格尔,情形则相反,可以说这两人实际上“没什么关系”。人们提到的只是1933年8月22日海德格尔给施米特的一封短信,在信中,海德格尔对这位普鲁士州议员寄给他(时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政治的概念》第三版表示谢意。施米特与上帝和世界经常保持联系,却没有或者至少没有进一步与海德格尔保持通信联系,没有像其他众多同时代人那样,给这位当时最知名的哲学家寄赠特印本书籍,这是颇为值得注意的。

在《语汇》中,恽格尔出现得最频繁。但也没有谁像他那样如此经常地遭到尖刻的批判、轻蔑的挖苦和辛辣的嘲讽。对“姓海德格尔的马丁”的批评(页111),语气看起来较为克制,实际上几乎同样尖锐。施米特与恽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关系虽如此不同,“情况”虽如此有别,十分清楚的是,恽格尔和海德格尔最终都遭到来自启示信仰立场的批判。在施米特看来,这两人都“自以为是”,甚至说恽格尔“刚愎自用到我自我迷狂的地步”(页293)。这些“自以为是”和“自我迷狂”的人到头来“都与自己的回声联姻”(页111、192)。他们没有向历史主人的“呼唤”敞开心扉。施米特发现,自己与海德格尔的“无神论”隔着一道深渊。

“我多少熟识一点《旧约诗篇》,从《圣经》中我读到:‘主是我的牧者,我什么也不缺乏’。我也多少熟识一点现代的哲学,在海德格尔的书中我读到:人是(在之)牧者”(页232)。通过施米特在其所反对